

历史学家

桑榆槐柳

丁伟志随笔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戴逸◎主编

桑榆槐柳

丁伟志随笔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历史学家随笔丛书



(桂)新登字 01 号

策 划 彭 匈 曹光哲

责任编辑 曹光哲 李庭华

责任校对 李带舅

历史学家随笔丛书

桑榆槐柳

丁伟志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邮政编码:530021)

南宁市河堤路 14 号)

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
9.625 印张 200 千字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1999 年 5 月 第 1 版

1999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5000 册

ISBN 7-219-03964-6 /K·800

定价:15.00 元

自序

广西人民出版社决定出一套历史学家随笔,承不弃把我也缚诸骥尾。难却盛情,只好效一把力。

其实,随笔是什么,我也弄不大明白。辞书的解说,也似乎不怎么清楚。我按常义去揣摩,以为这大概是指,和严谨的论说有别,信马由缰,随意而为的一种自由文体吧。小大由之,亦庄亦谐;可以述往事,可以思来者;可以写景,可以抒情;可以发发牢骚,可以幽他一默,如此等等,好像都是随笔能够容纳的东西。这样一想,随笔和散文、小品之间,也难以划清界线;不过,好在什么是散文、什么是小品,历来的定义也是模棱两可,有很大弹性的。

我自知本人有个短处，恰恰就是不大会把文章写得很放松。我写不好散文，写着，写着，就剑拔弩张，议长道短，写不出清风徐来、水波不兴的雅致情怀。我写不好小品，写着，写着，就显山露水，浅薄直白，写不出含蓄幽默、意在言外的无穷余味。

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是我天生缺乏文人雅士的才情吗？好像也并非全然如此。记得小时候上作文课时，还受过两次颇感风光的表扬；所受表扬的作文，恰好就像是散文一类的东西。一次是在小学六年级，写过一篇从青岛搭轮船，沿海岸线南下的游记。其中用了一些学过的地理、历史常识，但主要情节纯属虚拟。这篇习作，受到了老师的称赞，并且得到在课堂上朗诵的光荣。另一次是上初中一年级的時候，读了朱自清的《背影》之后，按老师的布置，写过一篇题为《父亲》的作文。大半与我幼年失怙的境遇有关，文章写得有些感情色彩，所以又得到了老师的一次大大夸奖，说它如何如何声情并茂之类。大约就是由于受到这类的表扬的缘故，少年时我也的确作过长大了当作家的梦。依此看来，当不成作家，写不好散文小品，完全是后天的原因所致。

虽然平生所从事的基本上是文字工作,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做的是所谓理论工作,而且早年所学的专业又是思辨性很强的哲学,这样一来,写议论文就成了我的文章的特色,或者说是长处——如果按不太高的标准衡量,算得上“长处”的话。这当然也就使得我的文风渐趋畸形,不大会写轻灵优美的记事文或抒情文了。想开了,好像也不值得自悲自叹,谁见过举重运动员兼跳芭蕾舞来着?

说了上面这些话,无非是想说明这本集子里所收的文章,只是一些随意之作,只可供有同好者茶余饭后消遣,是不值得拿来正襟危坐地研读推敲的。

这本集子的“杂沓议文”一栏里,也收了几篇学术性稍浓的文章,但在我看来,这都不是学术论文,而只是些在某些场合下做的即兴发言一类的东西,也就是说些“随谈”。把声音化为符号,把语言转作文字,“随谈”当然也就可以充作“随笔”了。只不过因为是做讲演,不得不庄重一些,不大好嬉笑怒骂,东拉西扯,所以作随笔看,似乎不够生动。谨此说明,敢请读者见谅。

由于是随笔,也就没有按学术论文的要求,作许

多规范化的加工。诸如引文之类,均未做详细注脚;有些是偶尔想到的,就写了上去,出处更未曾去查。这是假借随笔之“随”而偷懒,尚望学者们不以为罪。

这本集子里共收文章二十九篇,基本上是1997年、1998两年里写的;只有一篇是1994年写的、一篇是1996年写的。新作居多,容或算是稍可告慰读者、自我也由之稍感心安的地方。收入本集的文章,发表过的有六篇,已均于篇末注明发表的刊物及时间;这次收入时,也做了一点文字上的校勘。此外,还收了寄师友们的十封信,附在末尾,也算作随笔。信是旧的居多,但也有最近的一封。

至于集子的命名,是由于去年出了一本集子叫做《无树有巢》,后来想想,觉得似乎有些和现今保护生态环境的潮流不大协调,于是这回就干脆采取“矫枉过正”之法,用四棵树充当这一本集子的名称。

桑榆槐柳,无非是些普通的树木,不具松柏的高洁、梅竹的幽雅,但从小见惯了,也就感到它们亲切。因此,也就觉得这样一些寻常百姓家的树木,长着总比砍掉好。有感于此,这本集子里还收入了一篇《院花庭树》,借以表达我对绿化事业的真诚拥戴。粗树

木、闲花草,自有它们的价值,不好随意砍伐,也无须乎一律除掉,改种小麦、玉米。

1998年12月28日于京西小书巢

附记 这本杂七杂八文章凑成的集子,承广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彭匆同志、副总编辑曹光哲同志耐心审读了全稿。曹光哲同志又亲自担任了责任编辑,做了认真的编辑加工。《重筑小书巢》一文,也是按曹光哲同志建议补上的。对于他们和广西人民出版社各有关部门的帮助,谨此一并致谢。

作 者

1999年3月25日

目 录

自 序	1
-----------	---

问学散记

学、问、思、辨、行“五字经”	3
学贵知疑	12
黎澍论学	18
知识何以成了罪恶?	36
人,就是人	49
不会超然	57
拒绝“寻根”	63
院花庭树	71

杂沓议文

与友人论文明趋势书	79
中华文明溯源	87
活着的传统	
——关于传统文化现实作用的若干思考	97
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特点	110

“中体西用”述略	121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读孙中山《祭明太祖文》有感	137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若干问题的再认识	143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爱国主义三题	157
--------------	-----

心香一炷

杨质斋先生印象记	165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春雨潇潇过扬州	169
---------------	-----

跟随田家英做调查	175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不求强同,不惧独异

——缅怀邓广铭先生	194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送默存先生远行	202
---------------	-----

蓦然回首

兜圈子的人生	213
--------------	-----

负笈幽燕以来	220
--------------	-----

重筑小书巢	230
-------------	-----

怀念编辑生涯	239
--------------	-----

游意寻踪

找不到奥蒂赛依	248
---------------	-----

陪三老游罗马	254
--------------	-----

威尼斯是童话,翡冷翠是诗	261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那波里的中秋月	267
---------------	-----

旧信一束

致杨质斋(1981年9月30日)	276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致王元化(1995年5月10日)	278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致赵俪生(1996年12月3日)	28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致张作耀(1997年7月26日)	282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致陈乐民(1997年10月2日)	285
致杨义(1998年1月8日)	287
致壽山(1998年1月26日)	289
致张世林(1998年3月17日)	291
致余伯流(1998年4月10日)	293
致杨绛(1998年12月23日)	295

◎ 目 录

问学散记

学、问、思、辨、行“五字经”

去年(1997年),为着纪念已故著名文学家王统照(字剑三)先生百年诞辰,文学界举行了一些活动。我在报上看到臧克家先生以及剑三先生的公子立诚兄写的纪念文章,勾起了对剑三先生的一些片断回忆。怀旧之思,不能自己。

剑三先生的胞姊,是我的伯母,因此我也算是忝在甥辈了,跟着堂兄堂姐们称呼他“二舅”。加上剑三先生夫人,是家继祖母的侄女,我们都呼作表姑的,于是亲上又加了一层亲。正因此,父辈间与剑三先生的交往是比较密切的。他欧游时,不时有明信片寄给我的父亲。作为小辈的我,虽然从上初中时读过他的文集之后,就十分仰慕剑三先生的道德文章,可是受居处两地的限制,无缘获得多向他讨教的机会。现在记起的见面,算来也只有

四次。一次是1945年秋,抗战胜利后,他返回山东,特意到我家探亲。两次是1947年的夏季和冬季,我在北京求学,路经青岛时,先后到观海二路剑三先生府上拜谒过。还有一次,是在1949年建国前后,剑三先生到省里开会,会议期间到我工作的华东大学参观,不期而遇,我上前问安,他也立即认出了我,并亲切垂问近况。

印象最深的,当然是初见时。未见时,总想着这位学富五车、才高八斗的大作家,该是何等神气,何等高不可攀。可是抱着惴惴的心情去拜见时,见到的却是身材不高、和善可亲、装着俭朴、一口乡音(剑三先生与我的外祖家是同乡,都是诸城人)的“老人”(其实那时他并不老,还不到五十岁;觉得他老,是由于我还小)。如果把他放到我们中小学老师的行列里,简直挑不出什么不一样来,一点也没有大作家的特殊派头。当时我们兄弟姐妹们也懂得了与大作家见面机会难得,于是就像今天的追星族一样,纷纷拿出当时时兴的用各种彩色纸张订成的“纪念册”,请剑三二舅题词留念。他不但一概应诺,而且郑重其事地选词,郑重其事地书写,没有丝毫草草应付晚辈小儿的游戏态度。我那本纪念册,可惜早已遗失,有幸的是,剑三先生给我写的题词,五十多年来从未忘过。甚至那凝重端庄、墨色浓郁的字体,至今闭目想来,仍然如在眼前。记忆如此清晰,大约与剑三先生在我少年时心目中的知名度甚高有关,但也与他对晚辈所抱的诚恳态度和殷切期望有关。剑三先生给我的题词是:“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,笃行之。 伟志甥属剑三某年某月某日。”题词按旧例竖写,三字一行,自右至左凡五行。题款用较小字,概用楷书,一笔不苟。书法遒劲而又透露出清雅的书卷

气，刚柔相济，令我这样的学书未成的后生小子，实在爱不释手。

不过，十四五岁的我，当时并不真正懂得剑三先生给我题词的深意。回想起来，那时大约是觉得剑三先生给我写的，是一种很常见的勉励后学的话，要我学好就是了。小时读过《中庸》，也粗略地领会到这几句话是好话，可从来也没有想过这古老的格言里包含着什么不得了的深义。大约十来年后，蓦地得知朱熹老夫子正是把《中庸》上的这五句，定为白鹿洞书院的箴规，不免怦然心动，想起了当年剑三先生给我的题词，开始领悟到那是他特意选了这么几句来提示我注意治学态度的。可是在马克思主义已经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的时代，那几句旧时的治学箴言是不是还有什么价值，在长时间里，我想不明白，也没有认真想过。

1967年，和我在一个单位里工作的关锋（他是我所在的研究组的组长），向冯友兰先生的“抽象继承法”发动批判，这是我第一次感悟到文化继承一事的复杂性。本来，我学了新文化是“民族的、科学的、大众的”的道理，并衷心拥戴之后，一直没有再往深处考虑过，既没有想过旧文化是否可以定性为非民族的、不科学的、反大众的，也没有想过对旧文化究竟应该怎样继承才能行得通。思想幼稚，当然就把难题看成很好解决的易事，觉得对待旧文化，无非是把坏的丢掉、好的留着就是。冯先生提出倡议，主张对待旧有哲学命题，用“抽象继承法”，取其普遍性意义，弃其具体性意义，这一下便把应该如何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，从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。当时我觉得冯先生的主张并不难懂，以为无非是说，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文化继承方法。马克思对待黑格尔的

唯心主义辩证法,我们对待古代的“忠”“孝”之道,就都是在用这种方法来处置的。比如我们对待“忠”这个范畴,就是只取其忠诚的“普遍性意义”,而舍弃其忠于君主的旧的“具体性意义”,并另赋于忠于国家、忠于人民的新的“具体性意义”。这也不算我们的创造,孙中山早就发表过这类意见,只不过他没有从方法论上做出概括罢了。不过,对于在 50 年代的争论中冯先生的这一见解,我当时也觉得确实有些地方并没有说得太明白,比如旧时的文化命题是不是一概都要“抽象”继承呢?难道有些命题,如某些学习态度、学习方法之类的古训,不是可以直接的具体继承吗?至于关锋的批判,那就叫人无法看懂了。他的意思,似乎是认定一切旧哲学命题,只能“批判地继承”,亦即一概要经过“批判”才能谈到继承也。我当时想,“批判地继承”只是就对待文化遗产的总体而言,并不是说一切具体的概念、范畴、定义、命题,都必得经过一番“批判”的清洗。“学而时习之”、“学而不厌”、“学如不及”之类,何须要做“批判”,何须必得经过批判而后才能继承呢?记得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,我憋不住,说了几句。大意是说,在我看来,冯先生的抽象继承法确有不完善的地方,有些哲学命题本来也是可以具体继承的。犹如一幢旧房子的砖瓦,只要完好,不妨直接拿来盖新房子用。话没说完,就被关锋他们倾盆大雨般的批驳打断了。当时我毕竟年轻,不会把理由讲细讲深讲周密,思想问题没有解决,也就这么不了了之。后来我才明白,我的这种意见,比冯先生的抽象继承法更加“右”了,自然为“左”派见解所不能容。有幸的是,后来的几次思想运动中,居然没有人想起过我当年发表过这种言论,逃脱了被追究的厄运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,工农兵批